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吳 振 漢

## 前 言

歷史研究的角度，應儘量求其寬廣與均衡。而許多學者對歷史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研究，往往傾向於從中央的角度來觀察，如此難免使得一些地方的觀點晦暗不明，而失去史學研究的公正性。中國幅員廣闊，各地區因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的不同，而彼此差異甚大，若從地方的角度分析其與中央的關係時，又必須個別處理。本文即是經由對東北人士之流亡意識的研究，來探討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與中央的互動關係。

欲瞭解東北人士流亡意識的發展，首先必須先探究其本土意識的形成。因此本文第一章將追溯清代以來東北的開發，及其過程中東北人士本土性格的養成，和對該土地的認同。第二章主要討論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士流亡入關，其流亡意識的形成和演變，以及這種意識與時局的交互影響。第三章則敘述抗戰勝利後的東北接收情形，及東北陷共後，東北人士的第二次流亡，並論及本土性格和流亡歷史近年來對東北人士的遭遇之影響。最後做一總結。

本文史料基礎方面，大致可分文獻資料和口述歷史訪問兩部分。文獻部分，除參考近代史的相關書籍及報刊外，並徵引《東北文獻》、《傳記文學》、《文史資料選輯》等期刊中東北籍人士回憶性文章，以冀能從東北人士的角度，來看整個流亡意識的發展過程和影響。口述歷史訪問部分，除利用中研院近史所已做成之訪問記錄外，本研究並親自訪問了十餘位東北籍民代及文教人士（參閱附錄），並做成書面記錄。在訪問的過程中，除切身體會東北人士獨特的一些人文氣質外，也在觀念和常識上獲得相當多的提示，有時更獲贈難見的專書和手稿，對本文寫作助益甚大。

撰寫本文之目的，並不在於替某人或某些團體翻案，更不是刻意的要譴責或批判某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些歷史人物和事件。只是希望的事過境遷後，透過歷史研究，對一種地方意識做一理性、均衡的描述和分析，使我們對一些與東北人士有關的歷史事件之背後動力，有更深入的瞭解。民主時代，地方派系的運作必不可免，本文的研究或許能在這方面提供些許歷史智慧。

## 第一章 近代東北本土意識的形成

所謂「流亡意識」乃相對於「本土意識」而言，惟有當一羣人真正認同所居住土地，在其被迫離開故鄉時，才會產生共同的流亡意識，且此一意識才能強烈的左右其行爲動向，並進而影響到歷史的發展。近代東北的疆界，基本上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一連串與帝俄之不平等條約下才大致確定的，而「東北」一詞的確立，則更遲至民國初年。  
(註一)

論及近代東北本土意識的形成，至少得追溯至清代。而近人對清代東三省開發的研究相當豐富，早期學者如有高巖、謝國楨、蕭一山等，均做過清代東三省流人和移民的研究。(註二)近二十年來，學者如趙中孚、楊合義、Robert H. G. Lee 等對清代東三省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研究尤其可觀。(註三)但前人衆多研究大多偏重於東三省的漢化，與本章所論之本土化有別。事實上，任何一種強勢文化進入一新的地理環境中，都不可能不做適度的調適；尤其是與早已適應該地區的原住民長期交往時，亦不能不產生互相影響關係，更何況在清代東三省開發時期，漢族在某段時期，或某些地區亦曾是過少數民族，單方面的漢化可能不足以說明整個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故本章即擬在前人堅實的研究基礎上，對近代東北本土化形成做一探討。

清代東三省的旗地理論上是不得轉售予漢人的，但滿人又須仰賴漢人較高水準的農耕技術及商業經營，因此漢人乃利用租佃、典押等方式逐步取得土地，在這種相依相存的關係下，彼此的相互影響是無法避免的。在漢化方面，前人論述雖多，但却往往忽略了入關滿人對東三省漢化的貢獻，這些曾深入漢族腹地的滿人，後因故重返關外，對其同族的影響相當深遠。《黑龍江志稿》載：

延憲字克卿號舛庵，北京滿洲旗籍……光緒初戊齊齊哈爾。憲夙嫻漢、滿、蒙三種文字，舉止循循有規矩，授徒自給，門人多顯達者。(註四)

這類漢化滿人，其行止風度即具說服力，再加上又嫻熟滿、蒙文、其對東三省之滿、蒙族之漢化的影響自然也就更大。

由關內歸來的滿人除帶回上層文化，同時亦引進了一些民俗文化，《黑龍江外記》云：

（齊齊哈爾）城西普恩寺，俗稱娘娘廟……有紙本風來火土像，殿上揭一牌，楷書靈異記，杭州旗人華照撰。照自言乾隆壬戌以上晝得罪來黑龍江，途中夢碧霞元君，……自是醫學大進，痘疹尤著效。（註五）

碧霞元君信仰乃源自民間對「冥君」東嶽秦山的信仰，是漢族民間宗教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華北祭祀碧霞元君的娘娘廟甚多，華照其人很可能是途經華北時，深受此一信仰之影響，而將之引進東三省。

當東三省漢化的同時，出關的漢人也接受了一些滿人習俗。《寧古塔紀略》載：

凡各村莊，滿洲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註六）

東三省物產豐富，但却地廣人稀，因此滿人早已蘊育出一種熱情好客的習俗，漢人進入東三省，自然也受其影響。《柳邊紀略》云：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跡詭秘，……于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飯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註七）

前人研究亦曾引述此文，借以證明隨着「走山者」增多，東三省習俗有所改變，但該引文最後明言「尚非中土所能及也」，可見與關內究竟有別。當一文化進入一新地理環境，與當地文化交流的結果，常產生一種交融折衷的文化，此恐方為該引文真正蘊含的意義，同時這也是本章所論「本土化」的真正涵意。

至於日常生活方面，漢族也多有仿效滿族者，如《黑龍江志稿》載：

冬衣名哈爾瑪兒，……服之作苦最耐磨涅。各城婦女皆滿裝，即墾民亦習從之。（註八）

又云：

黑龍江漢、滿、蒙、回等人居處大致相同。城鄉之中，所有建築房屋均以樸素築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寒爲重。(註九)

黑龍江地處極北，氣候與內地迥異，新來之漢族墾民，很自然的便由原住民處學得衣、住適應之道。

此外，語言文字顯然對東三省各種族的融合也不構成不能突破的隔閡，精通漢、滿、蒙三種文字的個例前已論列，茲不贅述。語言方面的交流無礙，尤其有助於下層文化的融合。《黑龍江外紀》云：

晉簡與蒙古、索倫、達呼爾交易，皆通其語，問答如流，蓋皆童蒙習之，惟通國語者寥寥，滿洲多能漢語故也。(註一〇)

可見在現實需求下，東三省人民（尤其是滿人）能通兩種以上語言者相當普遍。

而異族間通婚的情形亦不罕見，從東三省各地方志〈列傳〉部分觀之，滿、漢通婚十分常見，且從清初便已如此。滿、蒙貴族的長期結親，則更是歷史常識。至於漢、蒙通婚，《黑龍江外紀》亦有記載：

過混同江北來直至多爾站，環站雜處皆蒙古，素與站丁往來，或結姻亞。(註一一)  
清代東三省站丁多係漢人充任。至於這種異族通婚的背景，東北籍近人錢公來有所解釋：

兩個民族，共同生存，都有彼此相需相依。相處久了，便益發多發見對方的優點與長處，忘掉對方的劣點與短處。於是「愛好和親」，不分蒙漢矣。(註一二)

異族通婚的結果，使得狹義民族主義的最後據點——血統論，亦失去了說服力。

東三省森林密佈，氣候酷寒，在開發這塊處女地的過程中，當地人民也被塑造出一種特有之冒險犯難之精神。滿、蒙兩族的淳樸、好武、重信義是各地方志一再稱道的。而漢族出關者也是歷經艱險，據《柳邊紀略》記載，當時偷出關採人參之「走山者」，每年死於飢寒者，「蓋不知凡幾矣」。(註一三)經這種九死一生的冒險生活之磨練，造就出東北人民強悍、豪邁的性格，故錢公來氏論其東北同胞個性時曰：

論其性格，能忍耐，富創造，慷慨好施，濟人之厄，因其當年受過飢寒困頓。

(註一四)

此一特質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流亡生涯中不時地流露出來。

另一方面，清初東三省漢人頗多係邊謫流戍而來，社會地位頗受壓抑，又不許參與科考，因此養成其倔強奮鬪的個性。即以呂留良後裔爲例，先有呂崇儒以「不得仕進，

學成，輒經商以資雄於塞上，齊齊哈爾之富，無呂氏若者。」(註一五)後有呂醒夫之「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註一六)而清末的日、俄交迫，更加深了東北人士的危機意識與奮鬥精神。

辛亥革命後，東北本土化情形並沒有滿清的覆亡及民國的肇建而逐漸減緩，反而在政治和軍事上更形獨立。當辛亥革命爆發後，新軍紛紛在關內各省得勢之際，東北地方性部隊——邊防軍，却在張作霖的領導下，成功的壓制住新軍，張氏並進而在十年之間，攫獲東北的軍政大權。張氏之能逆轉時代潮流，擊敗新軍將領和革命領袖，脫穎而出，恰反映出清代以來的東北本土化，已使關內、外情勢產生相當大的差異。而東北土生土長的張作霖，本身是東北長期以來本土化的表徵，他的豪邁粗獷，關懷大度，以門內尺度而言，可能不被視為一理想領袖，但在東北却頗得人心，因當時東北人的價值觀念，本即並不是完全「漢化」下的產物。

張作霖主政期間，雖曾在楊宇霆、姜登選等留日士官派的鼓動下，三度大舉入關。但當時以王永江、張作相分別為文、武首腦的東北保守派，則始終力主不介入關內政治，全力建設東北。王、張二氏並在主持遼、吉省政和東北大學及吉林大學期間，引用大量不滿張作霖窮兵黷武作為，却願投身於教育及建設東北工作的年輕知識份子。(註一七)也正因為這種東北本位的保守力量存在，張作霖方能每次在入關奪權失敗後，仍得以退出關外繼續做其名副其實的「東北王」，死後還能父死子繼的傳給其子張學良，這與關內軍閥一敗塗地，喪盡地盤的戰敗下場，又成鮮明對照。

張學良繼承父業後，除沿續乃父用人不疑，既往不咎(註一八)豁達作風外，又因其個人的少年得志，給東北政局的運作更添入幾分戲劇化的氣息。如所謂的「槍斃四院長事件」(註一九)，便充分顯出張學良任意妄為，敢作敢當的作風。民初東北軍政在張氏父子主導下，發展出一套別具一格的運作倫理，與關內政海中的縱橫排闖之術，截然不同，也伏下日後東北人士流亡入關後，常遭人忌之遠因。

民國十七年東北易幟以後，張學良的一些政策頗得新派知識份子的認同，如臧啓芳、高惜冰、高崇民、杜重遠、閻寶航等均投入張氏幕下，任秘書一類機要策劃的工作。但這些具全國乃至世界視野的知識份子，主要是團結在張氏抵抗外侮和民族統一的大旗之下，至於在其他政治理念的認知上，則甚為紛歧，此亦伏下九一八事變流亡入關後，彼此個自為政的遠因。另外，張作霖時代的老派軍政菁英，以及朱鬚青、錢公來、齊世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英等與張氏不合的國民黨員，均在張學良的寬容政治下，於九一八事變前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由以上所論述從清初至九一八事變前東北本土意識的形成過程，可知當東北人士開始流亡生涯之前，本身已發展出一些與關內文化有異的特質。但這些差異也不可被過分誇大，因為他們實質上仍屬一統一民族、國家前提下的差別，這種微妙的關係。可以東北籍人士田雨時的話來說明：

吾確愛吾鄉，吾曾愛吾國；人不愛其鄉，豈能愛其國？（註二〇）

而且即使在東北，遼、吉、黑三省之間，有時亦有紛爭，（註二一）吉、黑省也曾為遼省人士壟斷政權，而有過不平之鳴。

東北易幟後，近三百年來所發展出的東北本土化情形，本有望相應於統一國家的建立，而逐漸與全國人一統的文化取得一理想的調適，但日本軍閥的侵略却雖即來臨，於是東北人士便不得不背負着長期本土化所累積的傳統，踏上流亡的旅程。

## 第二章 第一次流亡（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四年）

以往學者對九一八事變後流亡入關的東北人士之討論，每每集中於他們發起或參與的幾次重要事件。本章則試圖追溯其整個流亡歷程，及其流亡意識之累積過程。以此角度觀之，則流亡意識好比一條容納衆細流的長河，隨着時間演進，蓄積越來越多的能量，一旦遭遇無法超越的阻礙，便激出一些震驚世人的政治事件。

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在三方面表現的特別顯著：第一、他們對造成其流亡的原因——日本侵略，反應最為激烈，入關後，他們始終是反日急先鋒，也是國人眼中抗日之表徵。第二、他們對其團體和傳統的延續特別重視，一旦此一事項面臨威脅，反應往往過激。第三、東北人士所遭境遇與處世方面，本即與流亡所至各地有所差別，故其常難免有寄人籬下，有志難伸之感。以上三種心態時時反映在東北人士流亡生活之中，此乃本章所欲探討之重點。

近年來學界針對九一八事變的研究，十分豐碩，本章偏重不同，故不擬重述。要之，學者大致同意，此一事件之主要禍首蓋為日本軍閥，而國民政府和東北當局亦當負相當的疏失之責，惟有東北老百姓是無辜受害者。東北人士踏上流亡旅程時之悲憤，實非

未親歷其境者所能設想，一位當時的流亡學生回憶：

我是遼寧省人，……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時，我剛跨過大學門檻十八天，馬上成了流亡學生，從車窗爬上免費火車前往平津，車過山海關時，我暗自發誓，我要參加收復東北工作，無論誰，只要領導我們打敗日本，收復東北，他就是要作皇帝我都擁護！自然，這種想法不免狹隘、幼稚，但我想當年這樣發誓的東北青年，絕不止我一年。（註二二）

東北人士本即以率性魯直著稱，又遭此突變刺激，其日後流亡過程中，思想行為漸趨極端激烈，實亦勢所難免。

當時流亡入關的東北人士可說各種身份者均有，包括軍政人員、教員、學生、農民、工人等等，以及他們的眷屬，不過一般農民和工人大多係於清末民初才移民至東三省，或只是季節性的由華北至東北討生活，故在山東或河北老家均尚有親朋好友，僅需將其遣返本籍，（註二三）善後工作即告完成。然而軍政人員和知識份子的情形則迥然不同，他們瞭解國內外情勢，懷抱個人理想和對國家的使命感，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有深層的東北本土文化情結。因此本章對東北人士入關後流亡意識的發展，將着重在對這些人動態的探討。為分析方便，茲將這些人士分為社會人士（包括黨政和一般民間團體人員），流亡學生，東北軍三大類，依時段分別加以敘述。

### 一、九一八事變至熱河失陷（民國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二年三月）

依政治立場而論，流亡入關初期的東北人士大致可分為親中央和反中央兩派，二者各有其組織、財源、政治主張、盟友和民意基礎。反中央派（或可視為東北主流派）以原東北民間團體領袖人物如……高崇民、杜重遠、閻寶航、盧廣績、王化一、車向忱等為主，他們的事業和發展空間均在東北，倉惶入關後，先企圖去投靠當時尚執掌華北軍政大權的張學良，但此時的張氏正是生活最靡爛時期，執意奉行「不抵抗原則」，並無出兵規復東北之意圖，僅設立「東北問題研究委員會」安插這些東北民間領袖，月支薪一百元，使無衣食匱乏之虞而已。（註二四）

在得不到張學良支持的情況下，這批原東北民間團體領袖於事變後的第十天，九月二十七日，聚集於北平舊刑部街奉天會館，決定自力成立一個東北流亡團體，並立時召開大會，推舉原瀋陽商會副會長盧廣績為主席，會中決議成立「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簡稱「救國會」)。大會同時選出三十一位執行委員會委員，再由執委會選出九位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下設三個組：總務組由金恩祺、盧廣績任正副組長，政治宣傳組由閻寶航、車向忱、李夢興任正副組長，軍事組由王化一、熊飛、彭振國任正副組長。(註二五)從「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執委會成員觀之，當時的確並無黨派之分，大家全基於抗日救亡此一信念前提之下，團結在一起。

「救國會」成立之後，首先面臨到的困難便是經費問題。儘管「救國會」的負責人中頗有一些昔日大實業家和商會領袖，但倉惶入關後，已一無所有，而張學良最初並不贊成該會的設立，故亦不可能要求其大力支援。因此「救國會」的負責人只得分頭向東北籍人士在華北任官者，或以往與東北素有淵源者募捐，結果所獲有限，歷程却甚艱辛，使東北人士首度帶到流亡過程中的人情冷暖。後張學良有鑑於東北各地纒起的義勇軍紛紛至北平向他求援，而其又不便公開給予支持，於是便決定透過「救國會」予以援助，而指定北平市發行愛國獎券，每月開獎一次，月入約二、三萬元，全數撥交「救國會」，此經費即成該會最大且固定的一項財源。(註二六)

「救國會」在各項財源漸有著落後，便展開各項工作。一方面先從事撫輯流亡的工作，設立東北中學收容流亡中學生。東北大學亦在北平復校。並成立東北難民教養院，院內辦有手工廠、小學、幼兒園。另一方面，該會負責人士有鑑於中央政府和一般人民均未對日本侵略和東北淪陷寄予應有之關注，故採取各項積極措施，如發行《救國旬刊》、《覆巢月刊》、《東北通訊》等宣傳刊物，又由馮庸、高崇民、閻寶航等，率領一進京請願團，赴南京要求中央政府採取積極抗日政策，沿途並廣爲宣傳，喚起民衆重視(註二七)該請願團於十一月五日由北平至天津，共一千餘人，(註二八)再沿津浦路南下，七日，到達浦口，乘輪渡江轉車至上海，先後與汪精衛和胡漢民會談，均不得要領。再於十日返回南京，次日，赴中央軍校晉見蔣中正，其他各地請願團亦趕到共同要求積極抗日，但仍無法改變政府既定政策，當東北請願團黯然過江反回浦口車站時，中央軍校二、三百名東北籍學生前往送行，論及時勢，「許多人落了淚，同感亡省亡家之痛」。(註二九)這時東北流亡意識裏，除了強烈仇日情緒外，又添入一些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感。

在促請中央積極抗日請願活動失敗後，「救國會」益發將不抗日之罪歸於中央，而與張學良關係日趨緊密，並在張氏暗中支助下，積極援助東北各路義勇軍抗敵行動和敵



後各項破壞行動，極盛時期，「救國會」軍事組織的義勇軍共計五十二路，人數估計達數十萬之多。(註三〇)直至民國二十二年熱河失陷，張學良下野前，以「救國會」為中心的東北主流派始終在張氏掩護支助下，從事各種自力救濟工作，其對中央之猜忌與隔閡已逐漸產生。

至於親中央派的東北人士則以「東北反滿抗日協會」（簡稱「東北協會」）為中心，其中尤以齊世英為中心人物。齊氏自參與郭松齡倒戈事件，與張作霖父子有隙後，即入關與國民黨接觸，尤其與陳果夫、立夫兄弟關係密切，一般視為所謂「CC派」東北系首腦。九一八事變後，齊氏在陳立夫協助下，聯合對張學良感到失望的臧啓芳、周天放、徐箴等東北籍人士，(註三一)並結合京滬各界有力人士在上海組成「東北協會」總會，並附設「北平分會」和「天津辦事處」，該協會理事包括各方人士，如外交方面的王正廷，財政方面的孔祥熙、張嘉璈，黨務方面的陳立夫，幫會方面的杜月笙，以及張學良的秘書長王樹翰和「救國會」派赴上海的杜重遠等人。(註三二)

「東北協會」的主要經費來源有二，一為向海外華僑募款；一為接受國民黨中央黨部秘密津貼。而其工作內容，則與「救國會」相近，一面募集國內外抗日捐款，支助東北一切抗日組織；一面分別在北平和天津設立知行中學（後併入東北中山中學）及興華小學，收容流亡學生。此外並成立「同義救濟會」，聯絡津沽幫會人士，共同從事抗日工作。(註三三)「東北協會」因得黨部支持，其經費來源和組織發展較為順利持久，但因所屬龐雜，包含各界人士，故其成員緊密程度似不及「救國會」，然並不能說親中央派人士皆為派系野心份子，或其愛鄉心情遜於反中央派，只是他們不相信能在張學良領導下打回東北，而認為中央的政策更為切實可行。

另外，國民黨為因應九一八事變後變局，特在北平成立「東北各省市黨務執行委員會委員辦事處」（簡稱「東北黨務辦事處」），此一機構雖名義上以張學良為首，但實際負責人多為「東北協會」成員，專門從事反滿抗日工作，實與「東北協會」互為表裏，後「東北黨務辦事處」在日本逼迫下，奉命遷至南京，其關外工作便移交「東北協會」代辦。(註三四)

東北流亡學生方面，事變後大部分得到平津市政府的安排，分派至各校收容或借讀。(註三五)而東北流亡人士惟恐其傳統和抗日返鄉使命乏人承續，亦紛紛建立東北流亡學校，其中影響最鉅者為東北大學、東北中學和東北中山中學三所。(註三六)由於各校創辦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人士的政治立場不同，所以校風亦有異，學生的思想行爲自然也就有別。

張學良兼東北大學校長，所以九一八事變後，便假北平奉天會館收容學生，設東北大學辦事處，後借得北平南兵馬司稅務監督署爲校舍，便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復課，張氏並在順成王府接見抵平全體教授，每人發給現洋二百元，學生每人十元(註三七)。次年，張學良商得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同意，改東北大學爲國立，由中央補助經費，(註三八)但與昔日在瀋陽時財源豐富的情形相比，自遠不如昔。張學良爲東北大學校長，東大教員及優秀畢業生又多經其安排工作或出國深造，故大多數東大師生思想自較傾向東北主流派，其後在經費不足，學校發展受阻的情況下，對中央不滿情緒更日益滋長。

東北大學創校於流亡入關之前，有其傳統與特色，教師大多任教有年，包括各類人士；而大學生年事稍長，亦有其獨立判斷和見解，故東大雖帶東北主流派色彩，但師生的主張，立場並不完全一致。然東北中學和東北中山中學則截然不同，兩校分別由「救國會」和「東北協會」所辦，均成立於流亡時期，創校之時已派系立場分明。二者唯一相同之處，在於均反映流亡中的東北人士，希望將其傳統和使命延續下去。

東北中學由「救國會」於民國二十一年創校，校址爲北平市社會局西單皮庫胡同倉庫，分高、初中部，共十餘班。張學良自任董事長、校長，王卓然爲副董事長，董事王化一、杜重遠、高崇民、閻寶航、盧廣績等均爲「救國會」重要成員。學校經費由張學良和「救國會」籌措，後經爭取，獲得中央部份補助。(註三九)東北中學學生因「肩負打回老家去的使命，在課程上軍訓較其它學校多些，每周六小時，由東北軍派來了軍事教官，並發了一個營的槍械彈藥，重武器有迫擊砲，輕重機關槍。東北中學在北平每年的軍訓比試都取得了第一名。」(註四〇)其校歌中更有「痛九一八之慘變，恣丑虜以侵凌。三千萬同胞沈淪浩劫，水深火熱相哀鳴。悵望故鄉，滿腔熱血如潮湧」(註四一)等辭句，流亡意識流露無遺。東北中學既由「救國會」所辦，又有東北軍教官任教，其親東北主流派之立場，不言可喻。

東北中山中學則由齊世英、臧啓芳、高惜水等「東北協會」重要成員所創辦，最初籌措經費困難，向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申請時，曾被視爲「請願者皆係反對張學良者，乃烏合之衆」，(註四二)後經二陳兄弟從旁協助，由行政院撥給五萬元開辦費，終於民國二十三年在北平建校。東北中山中學學生亦因「大家志在復仇，收復失地。而收復失地終須一戰，所以注重軍訓」。(註四三)同時校歌中也有「唯楚有士，難三戶兮，秦以亡。

我來自北方，回北方」(註四四)之悲痛勵志文句。不過，因東北中山中學為親中央東北人士所辦，故校歌中又有「以三民主義為歸向」之句，可見該校之立場不同於東北中學。東北中山中學成立後，除使親中央派的主張得以延續至下一代，同時也使一些親中央的東北知識份子，如李錫恩、董文琦、徐箴等暫在華北得一棲身之地。(註四五)

東北軍方面，其精銳部隊大多在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期間，隨張學良入關，九一八事變後，其他部隊亦在「不抵抗原則」下，陸續入關。而此時的張學良仍以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支配華北地區，部分原西北軍和晉軍的殘部，均歸其節制。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張氏引咎請辭陸空軍副司令一職，但隨即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仍掌握華北軍政實權。次年八月，張學良因與汪精衛不合，請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中央有鑑於張氏實力，另設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由蔣中正兼任委員長，仍請張學良代理委員長，權責不變。(註四六)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張學良將九一八事變後留駐華北之東北部隊整編為六個軍：第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第五十三軍(萬福麟)，第五十七軍(何柱國)，第五十五軍(湯玉麟)，第六十三軍(馮占海)，第六十七軍(王以哲)。(註四七)其中萬福麟和湯玉麟係張作霖之老部屬；于學忠原係吳佩孚部，後投靠奉系；何柱國為廣西人，但始終在東北軍中發展；馮占海所屬為九一八事變後由吉林撤出部隊編成；王以哲則為張學良親信，所屬亦為張之嫡系部隊。此時之東北軍實力幾乎不遜於九一八事變前，但因喪失東北，財源受損，被迫領打折的「國難餉」(註四八)，而且又蒙不抵抗之恥，故士氣已逐漸低落，端賴張學良個人權威維繫全軍之安定。

## 二、熱河失陷至「二二事件」(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至

二十六年二月)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下旬，日軍分三路進攻熱河，湯玉麟軍竟不戰而失承德，出援的東北軍亦不堪一擊，紛紛撤回長城以南，三月十日，張學良通電下野，中央另派何應欽代理北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軍歸中央直接指揮。張學良的毅然交出兵權，出洋考察，固然頗獲各界好評，但對流亡的東北人士，不異又是一次沉重打擊。九一八事變後雖已失東北，但他們尚可依庇於主控華北的張學良，張氏下野後，隨著華北局勢的日益惡化，這些東北人士遭遇到更多的挫折和苦難。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張學良離開華北後，「救國會」立刻受到影響，愛國獎券被華北行政委員會勒令停辦，該會財源斷絕，苦撐至是年秋季，不得不解散。另由「救國會」的常委們組成「復東會」，閻寶航任主任，高崇民任秘書長，繼續秘密從事抗日活動。(註四九)高崇民並於同年在北平發表《三民主義的眞諦》和《東北魂》兩本小冊子，譴責中央的退縮行爲，並呼籲積極抗日，早日收復東北。(註五〇)東北主流派人士的態度，在逆境中，愈趨激進。

民國二十三年至民國二十三年，對東北主流派之發展而言，是一相當關鍵的時期。從「救國會」縮編成「復東會」（暗喻恢復東北之意），使得此團體組織更緊密，意志更集中；而關懷範圍也從全國縮小至東北一區；此外因對東北義勇軍支援工作的停止，使「復東會」的工作漸轉至思想層面的鬭爭。而被東北主流派奉爲領袖的張學良，在此一時期思想上也經歷一急驟之轉變。以張學良當時的年齡、個性，以及遭遇而論，其在短短一年中，由極端腐化，頹廢轉變成精力旺盛，力圖振作，並不是十分值得驚訝的事。因此當民國二十三年，張學良歐遊歸來後，其所持的激進意識型態，與「復東會」成員們的心態十分接近，故二者很快的便又結合在一起。

當民國二十三年春，張學良返抵上海時，「復東會」重要成員前往探望，張學良百感交集的說「我回國時，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從香港到上海的船上，這些舊相知仍如九一八事變前那樣狂歡豪賭。竟然沒想到今天東北領土喪失，國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註五一)此時的張氏，與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士流亡入關之初，前往拜訪的張學良，可謂判若兩人。可是儘管此時張氏與「復東會」成員在激進抗日心態上一致，但在方法上却主張不一。

張學良在留歐期間，對主張極端的義大利法西斯黨和德國國社黨留下深刻印象，認爲中國若要快速強盛起來，可模仿二黨之組織和行動。但張氏自認聲望不夠，且獨力無法有效抗日，故主張擁蔣中正爲領袖，效法法西斯、納粹方式建國、強國；而「復東會」成員，對蔣氏長期主張「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感到疑慮，後在張學良極力勸說下方妥協。

張氏自返國接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一職，成爲華中地區實際上最高長官後，更積極企圖組成法西斯式的小組織，蔣中正對如此極端的建議略持保留態度，最後應允由構成張氏主要政治幹部的「復東會」成員，與以黃埔學生爲主的國民黨少壯

派「三民主義力行社」（簡稱「力行社」）重要成員，合組「四維學會」，名為「四維」之因，在於蔣氏希望此一組織之活動仍應限制於中國固有文化領域內，以免產生如法西斯和納粹黨的過激行爲。（註五二）

約在民國二十三年五月間，「四維學會」在武昌三省剿匪總部正式成立，成員包括「復東會」方面的王卓然、王化一、王以哲、何柱國、高崇民、閻寶航、黎天才等；以及「力行社」方面的劉健羣、鄧文儀、邱開基、戴笠、干國勳、丁炳權、趙龍文、韓文煥等人。並請蔣中正任會長，張學良副之。

儘管「四維學會」中的兩個次團體有一些相同的目標，但却有兩難以克服的障礙。其一為領袖問題，法西斯式團體必須有一位大家都絕對服從的領袖人物，以蔣中正一貫對黃埔學生的提携照顧，「力行社」份子自然對之絕對信仰，可是「復東會」份子則長期以來對其抗日態度感到不滿。因此當劉健羣、鄧文儀等引領「復東會」份子赴廬山晉見蔣中正途中，賀衷寒便與高崇民就領袖問題發生激辯，賀主張服從領袖須是無條件的，而高則辯稱：「只有自己的父母，是生來不變也無法改變，至於政治領袖，應該有條件。譬如領袖抗日，我們應服從。如不抗日，我們當然可以另行考慮，不只是盲目的服從。」（註五三）可見「復東會」份子對蔣中政的不信任，因而主張對領袖的服從是有條件的，而這惟一的條件便是必須積極抗日。賀、高二人的爭辯雖經衆人的勸解而平息，但爭論的關鍵問題，却始終未能完全解決。

另一更大的困難是，當時無論「力行社」或「復東會」份子，對法西斯主義真正的內涵並無深入的瞭解，事實上他們也無意完全推行法西斯的各項政策，他們所嚮往的只是使國家富強起來而已。不過，「力行社」份子是國民黨的少壯派，就其改造國民黨和國家的理想而言，時間是對其有利的，而且在「四維學會」組成前，「力行社」已透過「革命軍人同志會」、「革命青年同志會」、「復興社」等外圍組織，推行了兩年的改造國家運動，頗有些成果。而「復東會」份子則在前兩年裏，飽受流離失所之苦，面對日漸衰微的流亡團體和力量，只想早日強國，抗日和返鄉。因此「復東會」份子的激進，與「力行社」份子的緩進，彼此不能相容，更無法合作共進，最後「四維學會」成員根本無法透過協商取得共識，終而無形終止。東北主流派與中央取得和諧團結的最佳時機，從此失去，進而走向更激烈的反中央之途。一位「四維學會」中的「力行社」份子認為「後來西安事變，多少可能與『四維學會』終止有關」。（註五四）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四維學會」瓦解後，東北主流派的幾位重要人物漸轉赴京、滬一帶。上海一向環境複雜，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活動頻繁。杜重遠自九一八事變發生，被「救國會」派赴上海後，更與當地中間和左傾人士接近，並創辦《新生周刊》，後因該刊登載〈閑話皇帝〉一文，語涉日本天皇，遭日本領事館抗議，杜因而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被上海法院判刑一年兩個月，至翌年九月方得出獄。(註五五)

民國二十四年，高崇民流落至上海，此時高「思想已苦悶到極點。爲了抗日，各種辦法都試過了，但都失敗了。……真是感到前途渺茫，山窮水盡了。」(註五六)透過杜重遠的中介，高結識中共地下黨員宋克農（即係達生），此是高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共黨極端理論，發生相當的好感，不過最有興趣的仍是共黨積極抗日的主張。自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共產國際受到德國納粹黨興起的威脅，決定令各國共黨與其他黨派組成統一戰線，以扼阻極右勢力發展後，同年八月，中共爲求自救亦發表「八一宣言」呼籲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崇民在屢圖結合各方力量積極抗日挫敗後，此番初聞相同主張，便「決心跟共產黨走定了，就毅然決然地撕毀了國民黨黨證」。(註五七)

閻寶航在「四維學會」組成時晉見蔣中正，因表現沈穩，深獲賞識，被派至「新生活運動總會」工作，隱然成爲中央與東北主流派的聯絡人。閻氏此時期雖家住南京，但亦常赴上海與高、杜二人會商國事。民國二十四年底，盧廣績亦由海外返國，暫居上海。這些旅滬的東北主流人士雖無一正式組織，但往來密切，且已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所影響，並與共黨份子直接接觸。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日，張學良就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同月，高崇民即代表旅居京滬東北主流人士，在共黨份子協助下，由上海經平津赴西安。高於十一月抵西安後，除面見張學良，力勸其放棄執行剿共政策外，又運動東北軍將領，及扮演張學良與楊虎城聯絡人角色。(註五八)至次年四月，高因編著《活路》一書，主張聯共抗日，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東北軍中廣爲流傳，而被中央通緝，不得已逃往天津。但同年八月，在張、楊安排下，高再度潛返西安，同月，盧廣績亦應張學良電召赴西安，出任西北剿匪總部第四處處長。「西安事變」發生的次日（十二月十三日），張學良便下令成立一「設計委員會」，負責處理政治事務，高崇民、盧廣績均爲成員，高並任主任。「設計委員會」初成立的四、五天，每天開會，午、晚兩餐且在金家巷張學良私邸進餐，對處理蔣中正問題，以及組織聯合政府問題，討論十分熱烈。(註五九)但隨著張學良與

中央協調大員關係之改善，「設計委員會」的影響力逐漸減弱，十二月二十三日，該會決議要求張學良在取得具體保證後才可釋蔣，為張氏所拒。(註六〇)二十五日，張學良陪同蔣中正離開西安後，高崇民為營救張學良，不主張與中央軍開仗，因而不為楊虎城所容，而投奔駐紮渭南的東北軍劉多荃部。(註六一)

高崇民離開西安，東北團體的政治事務便落入東北主流派中的少壯派掌握之中，其中尤以「抗日同志會」的書記應德田為中心人物。(註六二)「抗日同志會」是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所組成的小組織，由張學良任會長，成員均為張氏新近提拔起來的一批少壯派，包括秘書應德田、苗劍秋，特務團團長孫銘久，手槍營營長喬同昌等人。(註六三)這批人對張學良絕對信仰、效忠，(註六四)而且深知其驟起之身價地位，全仰賴張之提拔，其返東北之願望，亦全寄於張之領導，若張氏不存在，則一切將歸烏有。因此彼等乃發動「二二事件」，刺殺當時東北軍中心人物王以哲，王因為陳誠保定軍校同期同學，當時對與中央和戰問題又態度曖昧，故遭少壯派猜忌而被刺殺。「二二事件」後，東北軍分裂，應德田、孫銘久、苗劍秋三人逃往共區。

民國二十二年張學良出國後，親中央東北人士認為是爭取東北流亡人心之最佳時機，於是身在華北的梅公任、徐箴等「前後組織並參加九一八周刊社，東北青年力行團，及東北青年學社」，(註六五)此外東北軍中亦開始設立「政訓處」，實施思想教育，由中央所派任之處長，亦皆為「東北協會」和「東北黨務辦事處」有關人士。不過，儘管張學良離開華北後，使東北反中央派人士一時羣龍無首，陷於徬徨無依狀態，何隨着華北局勢惡化，中央在該地區影響受日人抵制，中共乃趁機滲入活動，因此東北親中央人士的活動，反受到更有力的挑戰。(有關學運，兵運活動詳後。)

而正值親中央東北人士積極展開爭取人心工作時，其中却有些重要人士於此際被二陳兄弟借調至政府行政部門工作。民國二十三年春，時任江蘇省主席的陳果夫，派臧啓芳為鹽城區專員，王德溥為淮陰區專員，邵漢元為徐州區專員。此外，周天放被派任湖北省教育廳長，徐箴出任北平市電話局長。雖云二陳之意是為將來收復東北「預做生聚訓練儲備故也」，(註六六)但却使這些親中央東北幹才致力一般行政事務，此對「東北協會」在華北的爭取人心之工作有消極方面的影響。

民國二十三年，張學良返國後，主持豫鄂皖三省剿共事宜，與中央關係改善，亟欲整合東北流亡力量，共同抗日，中央亦樂見其成，故張學良特邀齊世英赴鄂溝通，三日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之間，二人多次傾談，然派系成見仍無法消除。齊世英並曾與郭松齡胞弟大鳴向蔣中正指控張學良種種不當措施。(註六七)張學良對東北流亡力量的整合失敗，及親中央東北人士的挑撥其與中央之關係，始終梗梗於懷。此亦為「西安事變」的遠因之一。

「西安事變」爆發後，親中央東北人士立刻發動救援委員長行動。曾任漢口市黨部常委，長期指導東北軍黨政工作的梅公任，立刻向中央推薦曾任第五十一軍及五十三軍政訓處長的栗直、曹德宣，及曾任第一一三師政訓主任的李仲華等人，潛入潼關，與王以哲等人取得聯繫，力保委員長安全。(註六八)另一方面，齊世英亦發動在南京的中央大學、中央政校、金陵大學、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中央砲兵學校內東北籍學生聯合簽名運動，通電西安，要求釋放委員長。(註六九)但由於親中央東北人士在事先不能有效防範「西安事變」的發生，事後救援的影響力又十分微弱觀之，其在東北流亡人士中，始終是扮演著非主流的角色，派系意識太重實為其發展之最大弱點。

流亡學生方面，自張學良出國後，東北大學由秘書長王卓然暫代校務。「東北協會」成員梅公任，曹德宣等組成「東北青年學社」、「東北行健學會」、「中華青年力行團」等組織，吸收東北流亡大、中學生。東大學生王大任、王長璽、關大成、王淑蓮等人，分任社團幹部。另一方面，中共也在東大發展組織，其中尤以參加過義勇軍而後復學的部分左傾學生最為活躍。(註七十)不過，直至民國二十四年「一二、九學運」之前，東大學生中的真正共產黨員為數極為有限。(註七一)

中共自發表「八一宣言」後，便積極展開對華北各大學的宣傳工作，其「聯合抗日」口號，對東北籍學生尤其吸引力。而此時日人又正傾力扶植冀東自治組織，使之脫離中央，成為日本之附庸，於是乃激起「一二、九學運」。參加此次學運的學生大多均動機純良，一心為愛國抗日，參與的學校亦僅有東大、北大、清大等少數幾所學校，但因北平政府當局採高壓政策，多名學生被捕，其中尤以東大十二人為最多。(註七二)繼而乃有「一二、一六學運」幾乎北平各校均有學生參加。中共亦趁機介入，從中操縱，其後並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之共黨外圍組織，大量吸收青年學生。

因東大學生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學運中表現激進，故事後軍警仍時常至校中調查搜捕學生，如此使學生們產生強烈反感，參加或同情共黨的人數激增。民國二十五年春季，東大學生宋黎、馬紹周等人赴西安請願抗日，其中宋黎為共產黨員



，馬紹周尚為外圍份子，結果馬被「中統局」工作人員逮捕，張學良因兼東大校長，負有照顧學生之責，在溝通不得要領後，乃下令搜查國民黨省黨部，造成與中央的磨擦。(註七三)同年夏季，張學良在西安成立「抗日學兵隊」，大批親共東大學生前往入伍。(註七四)同年十二月九日，西安各校學生紀念「一二·九」，數千人遊行請願，以東大學生先行，西安警察局長馬志超顧慮冒犯張學良，故不敢斷然處置，而向上級請示，張學良親赴灤橋與學生對話，示威行動固被勸止，但對張學良下定發動「西安事變」之決心頗有影響。(註七五)「二二事件」結束後，一些東大赴西安的學生，投向共黨。

東北中學自張學良離開北平後，處境亦日益困難。及至張學良返國，坐鎮武漢時，便將東北中學遷至鄂、豫間的鷄公山，借用山上新雲鶚大樓和湖北鷄公山管理局的華中避暑山莊為課堂和宿舍。(註七六)東北中學尚在華北時期，「CC派」的對學生工作組織已吸收一些東中學生；民國二十五年春，教育部通令全國高中一年級學生要集訓。於是東中七、八班去開封受訓時，部分學生又為「力行社」的外圍組織「復興社」所吸收；同年暑期，中共的外圍組織「民先隊」也打入東中，於是東北中學中的明爭暗鬥乃無止息。因東中本帶有的東北主流色彩，及國家大環境中抗日聲浪越來越盛，更激起東北學生的流亡傷痛，所以東中的左傾學生勢力日益增長，終而引起「蕭家港事件」，校長王化一開除十一名左傾學生，引發學生罷課，並向張學良請願要求改革校務。張學良不得已，免王化一職，自兼校長，又派孫恩元代理校長職務，但校中派系之爭仍無法完全平服。(註七七)「西安事變」發生後，河南省主席劉峙，乃多次派兵至東中搜捕左傾學生，一些「民先隊」學生因身份暴露遂不得不離校逃亡。(註七八)

民國二十三、四年間，正是以「CC派」為主的「東北協會」致力爭取在平東北流亡學生之時，但因華北情勢惡化，抗日呼聲日高，共黨份子亦得以打入「東北協會」成員所創辦的東北中山中學。當時中山中學「很有幾名共黨職業學生，其中為首者為姜紹禹、趙培榮……等人。他們年齡大，涉世深，論年齡幾與某些年輕老師相埒」。(註七九)後趙培榮雖因被查出私藏共黨宣傳資料，而被開除，但已有一些學生受其影響而左傾，後並在趙的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註八十)可見在中共抗日口號與學生流亡情緒結合後，即使長期接受擁護中央教育的學生，亦很難不受影響。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中山中學南遷至南京中華門外板橋鎮。不久，又發生學生反對參加軍訓抗爭，後經校方多方疏導，方得以平服。(註八一)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東北軍方面，自張學良下野出國後，軍紀大不如前，河北省民抱怨甚多。(註八二)而軍中對中央不滿情緒更甚高張，中央派至東北軍宣導的華北宣傳總隊長劉健羣回憶道：

我率領華北宣傳總隊到北平時，恰逢張漢卿先生去國外考察。東北軍內，牢騷甚多。日本人又多方造謠挑撥，有許多對中央的言語文字，超出了常情想像之外。  
。(註八三)

因此中央乃在東北各軍、師中分設政訓處長、主任，試圖加強思想教育。當時所派之人均為親中央東北籍人士，其中又以「CC派」為主。民國二十二年七月，經由陳果夫推薦，王德溥被任命為第五十一軍政治訓練處長，(註八四)隨後馬愚忱任第五十三軍政訓處長，(註八五)開始黨化東北軍工作。不過，東北軍究竟與張學良有深厚淵源，因此張學良歐遊歸國後，很快的便又完全掌握住全軍。

張氏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後，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何柱國之第五十七軍，劉多荃之百零五師（戰力約相當一個軍）隨之調赴華中剿共，其與中共紅二十五軍交戰雖不甚順利，但中共隨即逃往陝北，故未有大规模會戰。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于學忠調任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八月下旬，王以哲六十七軍，何柱國騎兵軍，董英斌五十七軍，劉多荃一〇五師，先後自豫鄂皖冀開往陝甘，九月，張學良出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

東北軍到達西北後，隨着局勢的發展，流亡意識中的三種主要情結均流露出來。首先軍人覺得越來離家鄉越遠，作戰對象也從日本轉為同是中國人的共軍，士氣大為低落。中共趁機大宣傳，軍中流傳共產黨張寒暉所作的歌「流亡三部曲」，歌詞中有云：「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在那悲慘的時候，離開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那年那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註八六)中共「聯共抗日」的主張，更激發了東北軍抗日情緒，及對中央的不滿。

其次，東北軍因領「國難餉」，早已憤憤不平，及至西北，經濟環境更形惡劣，故入關後覺得處處受歧視排擠的情緒更為增漲。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激流便曾對中央派至西北剿總任參謀長的晏道剛抱怨：「中央對東北軍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軍隊是雙人雙餉，我們則是糧餉不夠，兵也不補，到處流離，還要我們打內戰。」(註八七)王以哲也在一次宴會上，佯裝醉態，對晏道剛說：「我們的老家在東北，……我們從東北到華北、華

中，這次又到了西北，輾轉數千里，無非是想實現打回老家這一願望。誰想到陝西打仗，損失得不到補充，犧牲的官兵和家屬得不到撫恤，……流落在西安，一點救濟辦法都沒有。」言至傷心處，痛哭失聲。(註八八)

最後，最直接的打擊是東北軍在陝北剿共遭到一連串挫敗。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一一〇師遭伏擊，師長何立中陣亡。下旬，一一〇七師之六一九團遭夜襲，團長高福源被俘。十一月下旬，一〇九師被全殲，師長牛元峰自戕；同時一〇六師亦有一團被殲。(註八九)而更嚴重的是中央不願補充這些損失，使流亡中的東北人最害怕的事一流亡力量的逐漸消耗殆盡一成為事實。東北人士自入關後，一直竭力試圖維持軍力和傳統，以便打回東北，重建家園，但如今却似乎是與此目標背道而馳，更加懷疑中央是欲消滅東北流亡勢力。此際，非但軍中普遍怨懟，即連張學良本人的剿共決心也動搖了。中共趁機釋回被俘並遭洗腦之高福源，遊說王以哲及張學良，於是東北軍之剿共行動實際上已完全停頓。

臨「西安事變」發生之前，因為東北軍均駐防西安外圍地區（西安城屬楊虎城軍防區），而且高級軍官尚不夠激進，故張學良刻意提拔一些隨身少壯軍官，其中以孫銘久為中心，張除任命孫為特務團長外，又兼「抗日同志會」行動部長，發動「西安事變」時，張學良主要便是靠孫銘久所率領的這一支兵力。及至張學良陪同蔣中正赴南京後不久，孫銘久、應德田等「抗日同志會」成員，便發動「二二事件」，槍殺一些身在西安且被懷疑與中央勾結的高級軍官，此舉澈底破壞了東北軍之團結，其後羣龍無首，四分五裂的東北軍只有接受中央調遣，分離使用。

### 三、「二二事件」至抗戰勝利（民國二十六年二月至

三十四年八月）

從「西安事變」至「二二事件」，東北主流派力量受到極大的打擊，而其過激主張所造成之惡果，也使多數東北流亡人士對之無法再信賴，故其已不能再被視為主流派，且高崇民、閻寶航等人，自「西安事變」以後，與中共益發接近。視之為左派，可能最為恰當。另一方面，「西安事變」後，東北老派人物莫德惠、劉哲、劉尚清等又從新復出，收拾殘局，領導一些年青、溫和的東北流亡人士，形成一穩健中間派。而以「東北協會」、「東北黨務辦事處」為中心東北親中央派，仍保持一貫態度，相應於以上兩派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可視為右派。以下為敘述，分析方便，便就左、中、右三派之分，追溯此時段東北人士流亡意識之演變。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左派東北人士，在周恩來指導下，成立「東北抗日救亡總會」（簡稱「東總」），以高崇民、閻寶航、車向忱、杜重遠、盧廣績等人為主席團，栗又文為秘書長，于毅夫主編「東總」機關刊物「反攻半月刊」。(註九一)「七七事變」爆發後，「東總」又組織「戰地服務團」，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向延安輸送青年學生。(註九一)高崇民並將其獨子高存信送往延安，閻寶航的四個年長子女明詩、明英、大新、明智也都先後奔赴延安。

北平失陷後，高崇民先到濟南建立東北救亡總會山東分會，又赴山西建立山西分會。民國二十七年，又建立陝西分會，一面接受中共指導，進行抗日宣傳；一面向延安輸送青年學生。高並於此時向中共提出入黨申請，但經陳雲勸說，未辦正式入黨手續。(註九二)而閻寶航則已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秘密加入共產黨。(註九三)並以其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軍委會政治部戰地黨政設計委員等身份，為共黨蒐集情報，並掩護其地下工作人員。此時的「東總」已是十足的共黨外圍組織，而左派東北人士也已全面倒向中共。

民國二十八年，政府分別查封「東總」西安和成都兩分會，遂只剩下重慶總會。民國三十年「新四軍事件」之後，政府的反共政策更為強硬，「東總」重要成員，重慶大學教師徐仲航，中法比瑞文化協會秘書李羽軍等人均被捕。(註九四)

民國三十一年，政府為統一東北流亡組織，成立「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勒令所有東北流亡團體一律加入。「東總」雖拒絕加入，但已不能合法存在，工作人員相繼另謀生路。只有「反攻半月刊」的註冊尚未被吊銷，由高崇民等少數人勉強維持，與有「閻家老店」之稱的閻寶航公館，形成兩個僅有的東北左派人士的據點。直至抗戰勝利前幾個月，高崇民、閻寶航、陳先舟、金錫如等人，才在周恩來指導下，秘密組成「東北民主政治協會」，準備勝利後重建東北事宜。綜觀「二二事件」至抗戰勝利期間，左派東北人士已將原寄於張學良和東北軍的抗日返鄉之期望，轉託周恩來和共軍，因此甘為中共利用，甚至將下一代也送往延安，冀其在中共率領下打回東北。

經過「西安事變」和「二二事件」激變後，流亡東北人士痛定思痛，對過激行為普遍感到厭惡，再加上不久「七七事變」即爆發，半壁江山轉瞬淪陷，華北、華中許多人

士，也加入流亡行列，東北人士的流亡痛苦，如今有更多同胞來共同承當，也使東北人士的那種受排擠、歧視的流亡心態逐漸緩和。由於這些變化，溫和的中間派人士漸漸露頭角。

溫和勢力初次出現，是在「西安事變」善後安排時，老派人士莫德惠、劉哲、劉尚清等被邀請出面調解中央與東北軍之緊張關係，最後達成協議，由于學忠任江蘇綏靖公署主任、劉尚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以安置東北軍政人員，駐陝，甘的東北軍，則移調蘇、皖整訓。（註九五）

抗戰期間，莫德惠，劉哲均被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劉尚清也於民國三十年出任監察院副院長。當時上述老派人物及東北軍界大老萬福麟，鄒作華等，均寄居重慶南山一帶，年輕東北中堅人士，亦或居南山，或常赴南山向大老們請益，使南山成為抗戰期間東北流亡文化的重心，亦使「這羣曾從黑龍江、松花江、遼可流亡起，奔波輾轉，渡過黃河，又重聚在幾至長江的源頭，不無『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慰藉」，而「老祖宗昔年從關內向關外逃荒墾殖所遺熱情，也都一古腦帶到南山。」（註九六）

民國三十一年秋，政府有鑑於左派東北人士團體傾向共黨，而右派人士團體則人事糾紛不斷，故解散所有東北流亡組織，由中央從東北人士中遴選百餘名，另組「東北四省抗敵協會」，統籌一切東北抗敵救亡事務，並發行《東北前鋒》為宣傳刊物。該會所選出的常務理事和幹事「多係較少派系色彩或早已脫離『東北協會』者」，（註九七）可說是一以中間溫和派為主導的組合。

東北軍從「二二事件」至抗戰勝利期間，除萬毅、呂正操等部投共外，大致均接受中央指揮，但亦或多或少保留一些地方色彩，總體而言，其政治立場與中間派東北人士接近。東北軍自張學良離開和發生「二二事件」後，已不能自成體系，部隊由中央調遣，被分離使用，尤其是當民國三十二年，于學忠奉調軍委會參議院副院長後，魯蘇戰區撤消，原西北剿總所遺留下的參謀幕僚人員解散，自此東北軍即無軍以上的指揮機構。（註九八）

抗戰期間，東北軍在歷次戰役中損失消耗甚大，而其中尤其又以「俘虜葉挺之功不彰」一事，對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的影響最為深遠。民國三十年元月，中央決定對時在皖南發展的共黨新四軍實施包圍，由原東北軍精銳之第六十七軍於淞滬戰役後縮編成的第一〇八師，亦參與圍擊。同月六日，戰事爆發，至十二日，新四軍主力已被困山區，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戰力日消，該軍軍長葉挺有鑑於東北軍於西安事變前後與共黨友善，乃派時在該軍主管宣傳的林植扶和一張姓上校，至一〇八師六四四團談和，但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十四日，新四軍分兩股突圍，副軍長項英向西北屬川軍系統之第一一四師正面突圍；葉挺則向北方之一〇八師（實僅有六四四團）正面突圍，葉於突圍不成後為六四四團所俘。但該團將葉挺上送後，其戰功竟為上級所湮沒，而國軍戰史中對生俘葉挺一事始終記載不清，諱莫如深，甚至在參戰部隊序列表中亦漏列一〇八師番號。固然葉挺當時是有意選擇非中央嫡系的六四四團投降，但中央對該團之功實不應也不必抹殺，此舉使東北人士覺得受排擠、歧視的危機意識更為加深，該團團長李世鏡曾引張學良反省錄中所云之「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來說明西安事變後東北軍所受的不平待遇。（註九九）

「西安事變」和「二二事件」發生後，本是右派東北人士活動發展的最好時機，此時非但全國民衆和東北流亡人士均對原東北主流派人士過激行徑不滿，中央也有意支持以「東北協會」為中心的右派人士主導整個東北流亡勢力，但因派系意識過濃，視野格局太狹，右派人士終坐失此一良機。

「二二事件」後不久，「東北協會」重要成員臧啓芳便奉派接掌東北大學，但在秘書長周鯨文和工學院院長金錫如領導下，東大學生組成護校隊，堅拒臧啓芳的接收行動，（註一〇〇）校內部分支持接收的學生如王大任、張國維、王長熙等人均被毆傷，左、右兩派學生鬭爭激烈。（註一〇一）臧啓芳向西北軍系掌握的北平市社會局要求協助接收，亦得不到積極回應，只得暫借開封河南大學設立「東北大學時辦事處」，一方面請教育部停發在北平的東北大學經費，東北師生在經費無着落情況下，除一部分左派人士奔赴延安外，大多赴開封入學。抗戰期間，東大由西安再遷至四川三台，臧啓芳始終任校長，學生們雖逐漸傾向中間溫和立場，但仍偶有罷課等事件發生，直至勝利後再遷回瀋陽。

與東北大學同屬原主流派的東北中學也遭到相類似命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間，時任湖北省教育廳長的右派東北重要人物周天放「聲稱東北中學內部情況複雜，仿整理東北軍例，派『整理組』去校，並派趙雨時為該校校長。（註一〇二）趙也相同的受到東中師生抵制，迫不得已只得一方面斷絕其經費來源；一方面另設校址，方得勉強接收，惟東北中學在抗戰期間却始終不得安定，學運頻繁，齊世英至晚年猶認為，接收東中「是一個錯誤，是我的失敗。」（註一〇三）

另一方面，抗日戰起，「東北協會」與「東北黨務辦事處」均從而可公開展開抗日

工作，但因擴充過速，而國民黨中央對東北地下工作又採複線領導方式，各系統之間頗有隔閡，終而爆發民國二十九，「東北協會」幹事王榮濤與東北黨務特派員馬文煥勾結出賣同志，以換取情報事件。(註一〇四)此事件對「東北協會」和「東北黨務辦事處」打擊甚大。其後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另派羅大愚等人至東北發展地下組織，與「東北黨務辦事處」分頭工作；而「東北協會」也因「東北四省建設協會」之成立，而奉令結束，該會部分成員甚至一度難以維持生計。(註一〇五)

綜觀東北人士自九一八事變至抗戰勝利期間流亡意識之發展過程，可謂起初是越來越強烈，終而激出「西安事變」與「二二事件」，其後中間溫和派人士雖漸露頭角，但整體而言，東北流亡勢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左、右兩派，更是頻陷困境，無怪乎勝利後收東北時，流亡關內的東北人士只能扮演次要角色。

### 註 釋

- 註 一：《東北年鑑》（東北文化社年鑑編印處，瀋陽，一九三三），〈概論，東北釋名〉，頁…。
- 註 二：有高巖〈清代滿洲流人考〉，《三宅博士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未見原文，僅見楊合義論文引述）；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臺灣開明書店，臺北，一九六九）；蕭一山〈清代東北之屯墾與移民〉，《學術季刊》六卷三期（一九五八），頁一至四七。其他相關著作尚多，以上僅舉其要者。
- 註 三：趙中孚〈近代東三省移民問題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第四期下冊（一九七四），頁六一三至六六四，〈清末東三省改制的背景〉，《集刊》第五期（一九七六），頁三三三至三三五，〈清代東三省的地權關係與封禁政策〉，《集刊》第十期（一九八一），頁二八三至三〇二，〈清代東三省北部的開發與漢化〉，《集刊》第十五期下冊（一九八六），頁一至十六；楊合義〈清代東三省開發的先驅者……流人〉，《東洋史研究》三二卷三號（一九七三），頁一至三二，〈清代活躍於東北的漢族商人〉，《食貨月刊》五卷三期（一九七五），頁十三至十七；Robert H. G. Lee.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a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0)。
- 註 四：《黑龍江志稿》（一九三二），卷五七，〈人物流寓〉，頁十一至十二。
- 註 五：西清《黑龍江外記》（藝文印書館，臺北，一九六八），卷二，頁十三。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 註 六：吳振臣《寧古塔紀略》（藝文印書館，臺北，一九七〇），頁十。
- 註 七：楊賓《柳邊紀略》（藝文印書館，臺北，一九六五），卷三，頁二七。
- 註 八：《黑龍江志稿》，卷六，頁十八。
- 註 九：同前書，卷六，頁二四。
- 註 一〇：西清《黑龍江外記》，卷六，頁四。
- 註 一一：同前書，卷二，頁七。
- 註 一二：錢公來《東北史話》（中央文物供應社，臺北，一九五九），頁四一。
- 註 一三：楊賓《柳邊紀略》，卷三，頁十三。
- 註 一四：錢公來《東北史話》，頁十七。
- 註 一五：《黑龍江志稿》，卷五七，頁九。
- 註 一六：錢公來《東北史話》，頁十七。
- 註 一七：吉林大學校長李錫恩即是「從德國留學回來不接受張作霖任命任官職，而以一介書生說服吉林省長張作相，創辦省立吉林大學」。（崔垂言〈幾項片斷的回憶〉，《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一九八四，頁十四）；另外後來的瀋陽市長，來臺後行政院政務委員董文琦，對張作相的網羅人才，建設吉林，亦有深刻描述。（《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臺北，一九八六，頁二九至三二及頁一一五）有關王永江事蹟論著更多，可參考曹樹鈞〈回憶並懷念母校創辦人及歷任校長〉，《東北文獻》十三卷四期（一九八三），頁十五，李宗穎〈略述東北大學〉，《遼寧文史資料》第八輯（遼寧人民出版社，瀋陽，一九八四），頁六五至六六，以及錢公來〈王永江其人其事〉，《東北文獻》四卷四期（一九七四），頁十二等處之記載。
- 註 一八：《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臺北，一九八五），頁三九。
- 註 一九：一九三一年五月南京中央政府召開國民會議，張學良預擬一名單，要東北大學師生選為會議代表，但學生却紛紛投票給該校孫國封、周天放、臧啓芳、高惜冰等四學院院長。張誤認既彼此早有默契，東大師長事忙不宜離校參加會議故未予提名，但却出此結果，顯係彼等故意開其玩笑，故邀四院長至帥府，作勢欲槍斃四人，翌日釋之，一場鬧劇落幕。（寧恩承〈東北大學話滄桑（上）〉，《東北文獻》二十卷二期〔一九八九〕，頁十四至十六。）不過據臧啓芳〈哲先回憶錄〉記載，其離開東大的原因是與副校長劉風竹不合，（《東北文獻》三卷一期〔一九七二〕，頁五三至五四。）且一九三一年五月時，他已離開東大。另在李宗穎〈略述東北大學〉一文中，言被選上及被威脅將遭槍斃的是汪兆璠和孫國封兩院長及註冊部主任夏博泉。（《遼寧文史資



料》第八輯，頁八十至八一。）無論此一事件當事人爲誰，確有此一鬧劇發生，則無庸置疑。

- 註二〇：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四）〉，《傳記文學》，三六卷三期（一九八〇），頁一〇二。
- 註二一：例如民國十三年，國民黨黨員楊錫九，便因參加「古人治古」運動，爲張作霖下令就地正法。「楊氏臨刑前，痛陳奉系專橫，吉黑兩省軍政要職，奉天人士囊括一空。」（栗直《東北抗暴列傳》；東北文獻社，臺北，〔一九八八〕，頁一五四）。另如抗戰中期中央整理東北團體，建立一元化的「東北四省抗敵協會」時，所選理事，亦按遼、吉黑、熱四省分配。（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傳記文學》五一卷四期〔一九八七〕，頁三九。）
- 註二二：高語和〈我接掌遼北首縣西安回憶〉，《東北文獻》一卷二期（一九七〇），頁八十。
- 註二三：《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五版，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七版。
- 註二四：盧廣績〈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人民的抗日救國活動〉，《遼寧文史資料》第七輯（遼寧人民出版社，瀋陽，一九八三），頁十二至十三。
- 註二五：同前文，頁六至七。
- 註二六：同前文，頁八至十。
- 註二七：據報載，請願團南下過濟南時，「代表下車演說，聞者淚下。」（《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七日，第三版。）
- 註二八：《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六日，第七版。
- 註二九：盧廣績〈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人民抗日救國活動〉頁十二。
- 註三十：同前文，頁十八。
- 註三一：據臧啓芳〈哲先回憶錄〉載，臧啓芳與徐箴、周天放二人於九一八事變後，親訪張學良，見其頹廢生活，深感東北收復無望，彼此慨嘆不已。（《東北文獻》三卷二期〔一九七二〕，頁六九至七十。
- 註三二：栗直〈東北黨務工作輯要〉，《東北文獻》十七卷一期（一九八六），頁二六。
- 註三三：同前註。
- 註三四：同前文，頁二五。
- 註三五：當時平津各校大致尚能共體時艱，收容東北失學流亡學生，《大公報》的一篇爲東北逃難中學生請願的讀者投書，云：至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爲止，大約逃難至北平的流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亡中學生有三百餘人，無校可讀者男女共計近百人。（《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七日，第十一版）。大學生方面似較好，連上海的暨南大學亦登報招收東北各大學轉學生。（《中報》，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六版。）後來成爲上海各大學爲日本侵佔東北進京請願團總指揮的暨南大學學生俞康，即爲東北籍學生。

註三六：此外尚有念一、勵白等中學。

註三七：趙守仁〈張學良與東北大學〉，《遼寧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五期，頁八七。

註三八：李宗穎〈略述東北大學〉，頁七三。

舒毅敏〈東北中學簡史〉，《遼寧文史資料》第八輯，頁八六至八七。

註四〇：李江春〈憶東北中學〉，《遼寧文史資料》第十輯（遼寧人民出版社，瀋陽，一九八四），頁一七五。

註四一：舒毅敏〈東北中學簡史〉，頁九三。

註四二：鄭佩高〈創校經過又一章〉，《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頁二八一。

註四三：言金玉〈我爲軍訓教官爭到一顆星〉，《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頁二〇〇。

註四四：《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附。

註四五：董文琦〈中山創校五十週年感言〉，《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頁十。

註四六：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傳記文學雜誌社，臺北，一九八二），頁八五。

註四七：同前書，頁八七至八八。

註四八：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薪餉補給全賴河北一省稅收，另外二十九軍亦併入東北部隊範圍內補給，故只有將將官兵薪水一律減低。當時國軍其他部隊是「上尉支薪五十元，中尉支薪四十元，少尉支薪三十元。而東北部隊則減爲上尉四十三元，中尉二十六元，少尉十八元，依此類推，所有官兵薪餉，均比照減低。就這樣地做，也無法按時發薪」（王盛濤〈西安事變善後殉難的王以哲〉，《東北文獻》二卷四期〔一九七二〕，頁四三。）

註四九：盧廣績〈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人民的抗日救國活動〉，頁二四。

註五〇：高存信〈高崇民同志年譜〉，《遼寧文史資料》第十三輯（遼寧人民出版社，瀋陽，一九八六），頁九十。

註五一：盧廣績〈回憶閻寶航同志〉，《瀋陽文史資料》第七輯（政協瀋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瀋陽，一九八二），頁三六。

註五二：干國勳〈關於所謂復興社的真情實況〉，《傳記文學》三五卷五期（一九六二），頁

八五。

- 註五三：劉健羣《銀河憶往》（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一九六六），頁二三四。
- 註五四：于國勳〈關於所謂復興社的真情實況〉，頁八五至八六。
- 註五五：關國焯〈杜重遠〉，《傳記文學》三九卷四期（一九八一），頁一四七。
- 註五六：聶長林〈回憶高崇民同志〉，《瀋寧文史資料》第十輯，頁九。
- 註五七：同前註。
- 註五八：高存信〈高崇民同志年譜〉，頁九十至九一。
- 註五九：李維城〈西安事變片斷回憶〉，《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六），頁一七五；盧廣績〈西安事變親歷記〉，《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九四。
- 註六〇：王鐵漢《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頁七七。
- 註六一：高存信〈高崇民同志年譜〉，頁九一。
- 註六二：應德田，東北大學第一屆政治系畢業，被送至美國留學，歸國後任北平念一中學（為流亡東北人士所創辦）校長。民國二十三年，張學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時，調應德田等東大畢業生，任總部中下級幹部。待「四維學會」瓦解，「復東會」成員各奔東西，應德田等人漸為張學良倚為主要政治幹部。
- 註六三：蔣同昌〈我所經歷的三三事件〉，《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五〇九。
- 註六四：高崇民、閻寶航等人常以兄長份向張學良進言，而王以哲、何柱國等雖係張之部屬，但論年齡則屬平輩；只有「抗日同志會」中的少壯人士，對張學良是絕對信仰，完全服從。
- 註六五：栗直《東北抗暴列傳》，頁二〇三。
- 註六六：同前書，頁二四八。
- 註六七：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傳記文學》五卷四期（一九八七），頁三八至三九。
- 註六八：栗直《東北抗暴列傳》，頁二二一至二二二。
- 註六九：趙毓麟〈西安事變時CC派在中政校的活動〉，《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二九五。
- 註七〇：義勇軍復學的東大學生宋黎、張稚軒、張德厚等，均在參加義勇軍戰事後期方逐漸左傾，及至民國二十三年，義勇軍陸續結束，重新復學後，乃結成小組織，積極活動。（張國維〈義勇軍中一小兵〉，《東北文獻》六卷三期〔一九七六〕，頁四十至四一。）
- 註七一：〈項乃光訪問紀錄〉（一九九〇年二月七日）。
- 註七二：《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三版；李宗穎〈略述東北大學〉

## 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士的流亡意識

，頁八二。

註七三：〈項乃先訪問紀錄〉；趙守仁〈張學良與東北大學〉，頁八八；徐新生《一二九運動與民先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五〉，頁一八五；李震漢〈西安事變的前因與經過（一）〉，《傳記文學》三九卷六期（一九八一），頁十五。

註七四：趙守仁〈評張學良將軍思想演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頁八六；孫銘久〈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做的幾件事〉，《西安事變親歷記》，頁八五。

註七五：李宗穎〈略述東北大學〉，頁八二。

註七六：舒毅敏〈東北中學簡史〉，頁八六。

註七七：同前文，頁八八。

註七八：李江春〈憶東北中學〉，頁一七七。

註七九：編者〈職業學生遭發現〉，《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頁三〇一。

註八〇：同前註。

註八一：曹延亭〈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究竟控制在誰的手中〉，《遼寧文史資料》第十輯，頁一五三至一五四。

註八二：沈亦雲《亦雲回憶》下冊（傳記文學雜誌社，臺北，一九八〇），頁五三四至五三五。

註八三：劉健羣《銀河憂往》，頁二三二。

註八四：王德溥〈五十年政治生涯（七）〉，《東北文獻》二卷四期（一九七二），頁二五。

註八五：劉健羣《銀河憶往》，頁二三二。

註八六：傅虹霖《張學良與西安事變》〈時報文化公司，臺北，一九八九〉，頁一二九。

註八七：晏道剛〈我在見安事變中的經歷〉，《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二〇三。

註八八：張玉芬〈王以哲將軍聯共抗日思想的形成〉，《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七年第二期，頁七四。

註八九：杜連慶、陸軍〈東北軍史略〉，《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頁八三。

註九〇：曹靜岩〈閻寶航是重慶地下黨秘密聯絡站〉，《長春社會科學戰線》，轉引自《傳記文學》五五卷六期（一九八九），頁三九。

註九一：聶長林〈回憶高崇民同志〉，頁十二。

註九二：高存信〈高崇民同志年譜〉，頁九二。

註九三：曹靜岩〈閻寶航是重慶地下黨秘密聯絡站〉，頁四十。

- 註九四：同前文，頁四一。
- 註九五：田雨時〈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致于學忠函〉，《傳記文學》四十卷一期（一九八一），頁十八至二十。
- 註九六：李田林〈重慶南山東北人物瑣憶〉，《傳記文學》十七卷四期（一九七〇），頁三二。
- 註九七：田雨時〈齊世英先生靈棺論〉，頁三九。
- 註九八：王匡〈談于總司令學忠先生生平〉，《東北文獻》十四卷一期（一九八三），頁十。
- 註九九：李世鏡〈我如何俘獲匪首葉挺——解決「新四軍事件」作戰回顧〉，《東北文獻》十四卷四期（一九八四），頁十五至二二，李世鏡〈有關俘獲匪首葉挺答客問〉，《東北文獻》十五卷一期（一九八四），頁六至二十。
- 註一〇〇：陳彥之〈記東北大學進步學生抵制國民黨接管的鬭爭〉，《遼寧文史資料》第十輯，頁一二一至一二三。
- 註一〇一：王大任〈一篇反共救國護校血淚奮鬥史〉，《東北文獻》創刊號（一九七〇），頁五九至六八；〈王大任訪問紀錄〉。
- 註一〇二：舒毅敏〈東北中學簡史〉，頁九一。
- 註一〇三：齊世英〈中山的創校與遷校〉，《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頁五。
- 註一〇四：栗直《東北抗暴列傳》，頁七八及頁二九九。
- 註一〇五：例如曾兼代「東北協會天津辦事處」主任的韓清淪，一度曾「擬營一豆漿店以糊口」。（栗直《東北抗暴列傳》，頁三〇三。）